



复旦文史专刊之九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中国的日本认识 日本的中国认识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复旦文史专刊之九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中国的日本认识 日本的中国认识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15.4
(复旦文史专刊)
ISBN 978-7-101-10730-2

I. 中… II. 复… III. ①中国学-文集②日本-研究-文集
IV. ①K207.8-53②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5631 号



书 名 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

编 者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执行编者 朱莉丽

丛 书 名 复旦文史专刊

责任编辑 胡 珂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0½ 插页 2 字数 188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730-2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序	杨志刚(1)
平安末期日本对中国医学的接受	榎本涉(3)
北宋对外交往机制的另一面	
——以《参天台五台山记》的记载为线索	朱 溢(17)
从遣明使记录看明朝地方在朝贡制度中的作用	
——以嘉靖年间宁波对日本贡使的接待为例	朱莉丽(30)
关于战后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趋势变化之小考	
——主要以岛田虔次和沟口雄三为例	伊东贵之(46)
“辛酉革命”说与龙朔改革	
——7—9世纪的纬学思想与东亚政治	孙英刚(57)
铃木大拙理解的“日本式”和“中国式”	
——以《日本式灵性》为主的考察	末木文美士(77)
周氏昆仲的日本观	胡令远 艾 菁(89)
中国宪法史上的明治宪法	
——以伊藤博文的中国观为据	泷井一博(99)
竹内好对近现代中国的认识及其影响	刘建辉(106)
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和认识	
——兼论大正·昭和前期日本人的中国认识	徐静波(116)
回顾·沿袭·考辨	
——从姜宸英看清初士大夫对日本的一般认识	朱海晶(131)
综合讨论	(151)

序

中华书局 1992 年起陆续推出十卷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周一良先生在序言的篇首赞其为“甚盛事也”。该著编选出版的学术意义，周先生在序中早就讲的比较全面了，这里可以补充一点一位读者的个体阅读体验：笔者犹记当年急切购得第一卷，彻夜展读、欣喜无比，以及此后逐步翻完这约三百万言的译著，因视野打开内心生出一种丰沛充盈的感觉。

周序曾期盼，假以时日，例如二三十年，完全应该能够编出一部《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论著选译》，这样中日两国史学界的双向交流就更趋完整。二十多个春秋过去了，周先生的预言尚未实现，不过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研究”或“日本研究”的相关理念、视角、方法，却的确发生了诸多重要的变化，从中折射出学术研究的转型。这是最近二三十年，中国人文学术基于不断积累而开始迈出的重要跨越。

进一步梳理脉络，还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彼时，“东洋史”作为一种新的学科已在日本兴起。1899 年，桑原骐藏的《东洋史要》中译本由王国维作序，在中国印行，不久便在知识界引发不小的“旋风”，并汇入“新史学”的浪潮。这本中国近代译自日本的第一种史书，强调亚洲诸国之间的关系（时人或概括为“合东洋诸国为一历史团体”），给中国引入了基于“亚洲”的世界史的眼光。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百年后的中国史学界，固守所谓“中国史”、“世界史”的各自畛域，无视乃至割裂“中国”与“亚洲”的关联，仍不乏见。也就难怪，最近一套由日本学者撰写的“中国的历史”书，被翻译过来在中国出版，激起反响，引人企慕的主要原因还是（恐怕也只能是）邻国史学家的“角度新”、“写法新”、“立意新”。

置于上述脉络和环境之中,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最近七年努力的宗旨和意义,更得显明。一年多前举行“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研讨会的用意,似也应于此抉发。对于这样一个标题的学术讨论会,笔者最粗浅的一点认识是,中国和日本,可以互为“观者”、互为“他者”,也可以互相结合,从而在更大的背景下予以审视。

2007年起,文史研究院开始推动“从周边看中国”课题,另有“交错的文化史”、“批评地理解国际中国学”、“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中国宗教、思想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四个方向,相辅而行。而后,凝炼出“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硕士生和博士后,与普林斯顿大学、东京大学合作举办夏季研修班。这些科研、教学的收获,介入了前述学术研究的转型与跨越。

“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研讨会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京都)主办,《复旦学报》协办,于2013年初春在复旦校园召开。十余位中日学者分四场展开讨论和交流,气氛坦诚、热烈。四场的主题分别是“前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中日学者对彼方思想史的相互观察”、“近代中日学者对彼方的认识和研究”、“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本书即是该研讨会的论文集,可以为读者呈现这一领域的最新动态和进展。

要感谢论文作者,感谢各位支持研讨会或参与会务的朋友。最后还应感谢中华书局,这已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会议论文集的第九种了。正是在书局的关爱下,这套“复旦文史专刊”渐渐在形成自己的阵势和风格。

杨东刚

2014年7月16日于复旦光华楼

平安末期日本对中国医学的接受

榎本涉(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绪论

本文想要讨论的是在平安时代(794—1185),特别是其末期的12世纪,日本对同时代中国医学的关心。一般认为平安时代医学的代表性成果是《医心方》30卷(984年,丹波康赖编),它是以唐以前的中国医书为中心摘录或引用诸书而成的。不过在此书之后,日本医学就进入了成果寥寥的低迷期。而打破这种状况的,一般认为是在接受宋刊本医书的镰仓时代(1185—1333),医学中心从宫廷医向僧医的转移。

若看医学史上的成果,与镰仓时代相比,平安时代宋代医学的影响之小确实不可否认。然而,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少有机会出国海外,外国人也几乎无缘来京都;而在镰仓时代,具备旅宋经验的僧人活动于日本各地,宋元僧更是统领着京都、镰仓等地的寺院,所以,两者在对中国医学的接受度上有差别是当然的。本文试图撇开文化成果的水平高低,只作为了解平安时代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看法的一则材料,意在探讨他们对同时代中国医学的关心。

一、《大观本草》的利用

平安末期的藏书目录《通宪入道藏书目录(以下称“通宪目录”)》,在第

37—40 柜集中收录了医书^①。其中受到注目的,是第 38、39 柜所收《大观证类本草》32 卷(上帙 10 卷,中帙十卷,下帙 12 卷)。它相当于北宋艾晟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31 卷,是对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加以增补后,于 1108 年刊行的。卷数上有一卷的偏差,大概是《通宪目录》在正文外又加了一卷目录^②。从书名判断,《通宪目录》是信西的藏书,那么《大观本草》应该是在信西生前传入的。而实际上,虽然此书目无疑是平安末期的产物,但其中所收书目全为信西藏书一点自古就有疑问,所以以本目录为依据判断《大观本草》传入年代的下限,我想是要谨慎的^③。

不过,平安时代对《大观本草》的利用,从其他史料中也可获知。其中之一,便是在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春记》纸背所写的“圣教”^④。这是 1143 年,为祈祷延长鸟羽院的寿命而实施如法尊胜法的相关资料^⑤。其中有担任祈祷的僧人宽信题为《骨路草事》的勘文。为了讨论祈祷中使用的骨路草是怎样的东西,宽信记到去年为鸟羽院实施祈祷期间,他在高野山上采ウリネ的事情。这篇勘文大概写于 1143 年的两年后,即 1145 年。虽然将ウリネ等同于骨路草的根据,是 1108 年范俊采集ウリネ并施行如法尊胜法时,在记录中用“ウリ子”作“骨路草”的注音假名,不过在勘文中,宽信引用了《大观证类本草第八》“骨路友”条作为参考资料,也就是《大观本草》卷 7 的“骨路支”条^⑥。由此可知,宽信在 1145 年以前就看到过《大观本草》。

① 以下引用于《通宪入道藏书目》第 37—40 柜(一合第卅七柜:病源论一帙十卷,同二帙十卷,同三帙十卷,同四帙十卷,同五帙十卷;一合第卅八柜:大观本草目录一帖,大观证类本草上帙十卷,同中帙十卷,药证病原歌一结四卷,合药方一帙二卷;一合第卅九柜:大观本草下帙十二卷,医书要字二卷上下,药种略决一卷,要药秘方一卷,本草和名下一帖,应验如神方一帖,宋人密语抄一卷;一合第卅柜:胜金方上帙九卷,同中帙十卷,同下帙十卷,一帖同目录)。

② 在日本,正文卷数和前面的一卷目录是加在一起数的,所以后文所提《春记》纸背的圣教在正文是卷七,却称作“第八”。不过,《通宪目录》中另见《大观本草目录》一帖,虽然和《大观本草》32 卷分别列出,但从“卷”“帖”的不同写法看来,两本书是被看做不同的书的。我想《大观本草目录》一帖,可能是为避免损坏目录原本,而在日本另做的折本形式的目录。

③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吉村茂树 1928 年的论著。虽然对于吉村的说法,也有些批判性意见,但这些批判未有有力的根据。棚桥光男:《后白河法皇》,东京:讲谈社,1995 年,第 80—84 页。

④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品图版目录(书籍编)》第 74 页(照片)及 248 页(翻刻)。

⑤ 关于这个圣教,杉本理在 2009 年的论著中有所讨论。另外,关于如法尊胜法的性质和完成过程,详见上川通夫在《日本中世佛教和东亚世界》(『日本中世仏教と東アジア世界』,东京:塙书房,2012 年)第二部,第 2、3 章中的研究。

⑥ 以下引用勘文的部分内容(另附图):范俊僧正,天仁元年公家御祈勤修,如法尊胜御修法(国王延寿祚之法),件支出骨路草,即附假名,云ウリ子云云。所遣取高野山也。宽一(译注:此处有原注“宽信”)去去年一院(译注:此处有原注“鸟羽上皇”)御祈奉仕件法、又遣取高野。件草、彼山多多也。大观证类本草第八云,“骨路友(译注:此处有原注“支”),味辛,平,无毒,主上气浮肿、

对《大观本草》的利用还有一例。在记录合香制法的《薰集类抄》卷下,诸香“证类云”下所引注文中,可以看到对《证类本草》即《大观本草》的引用^①。由《薰集类抄》上下卷的跋文可知,此书是刑部卿藤原范兼(1107—1165)奉敕抄集而成。虽然此“敕”所指的是谁意味不明,不过既然是“敕”,就可以认为是有王家参与的^②。

无论是《春记》纸背的圣教,还是《薰集类抄》,都与王家指挥下实行的事业有关,所以两书所参考的《大观本草》有可能是王家的藏书。而录有《大观本草》的《通宪目录》,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含信西旧藏在内的宫廷文库目录。若是这样,那么以上三本书中所见的《大观本草》,都与王家关系甚深。

此外,我认为与《大观本草》的传入有关的史料,是藤原宗忠《中右记》元永元年(1118)正月二日条^③。此前稍早,大概在1117年左右,白河院(1087—1129年院政)曾经从宋获得“卅帖”刊本医书。对此感兴趣的宗忠借走书后,这一天从关白藤原忠实处得知,因为紧急归还命令,要他今明之间返还此书。虽然宗忠也有抄写此书的愿望,但他写下“尤可谓秘藏书欤”^④的感慨,似乎认为白河院是舍不得长期外借的。

我想这本书可能就是《大观本草》31卷,而“卅帖”可以看作概数。一方面,在概览了对宋代医书的刊行进行网罗式调查的冈西为人的研究、《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六、南宋的书籍目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三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三中所收医书之后,几乎没有其他的书符合条件。

水气呕逆、妇人崩中、余血症瘕、杀三虫。生昆仑国,苗似凌霄所肖(译注:“所肖”二字有原注“霄”)藤,根如青木香。安南亦有。二(译注:此处有原注“一”)名飞滕云云。此文要须也。若ウリ子欤。而难寻医家并儒家,不知和名,尚可考习事也。权大僧都宽一(宽信)其中“大观证类本草第八”条,用柯氏影印本《大观本草》卷7所引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逸文对校,并从旁注出。不过,最后两字在《大观本草》和元张存惠本《政和本草》中都作“飞滕”,而正字可能是“飞藤”(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8,骨路支条所引《本草拾遗》逸文)。

① 沉香、苏合香、鸡舌香、零陵香各条。以零陵香为例,《薰集类抄》中“证类云,味甘平无毒主恶气心腹痛满令体香和诸香作汤丸用之得酒良叶两两相对茎方也”的描述,大概是把《大观本草》卷9中相应的注文“味甘,平,无毒,主恶气、疰、心腹痛,满下气。令体香和诸香,作汤丸。用之,得酒良”,和《图经本草》中的引文“叶如麻,两两相对茎方”接续整合而成的。

② 根据田中圭子2004年的论著和《群书解题》(岩桥小弥太执笔),范兼在1126年任鸟羽院的藏人,1155年在还是皇太子的后白河天皇宫里任东宫学士,后白河天皇即位后,历任大学头(1156)、刑部卿(1162),二条天皇时又以歌才获得重用。我认为鸟羽院和二条天皇,都有可能是敕命范兼撰述《薰集类抄》的人。

③ 近日从唐所持来之医书,从院(译注:此处有原注“白河上皇”)借给。诚有兴书也。摺本卅帖,忽不能书留。依念返召,今明可返出之由,殿下(译注:此处有原注“藤原忠实”)所被仰也。尤可谓秘藏书欤。

④ 译注:中文原文参见前注。

另一方面,稍微符合条件的书,也几乎没有在1117年前传来日本的迹象。首先,《政和本草》30卷虽然也刚刊后不久,但此书的传入似乎相当晚^①。王璆《是斋百一选方》虽然有30卷和28卷两个传本^②,但它成于12世纪末,所以白河院也不可能得到^③。而1066年虽然刊行了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的官订本《备急千金要方》30卷,但《千金方》已见于9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又被《本草和名》、《医心方》等引用,所以在平安时代的日本已经广为知晓。即使有新校订,宗忠和白河院是否会表现如此大的关心,也是有疑问的。

与《备急千金要方》同时,虽然也刊行了孙思邈《千金翼方》30卷,但此书在日本被引用要到13世纪末以后。而王砮《天元玉策》30卷(佚书)连是否刊行都无法确定,在日本直至后世也没有参考它的迹象^④。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这两本书传入的可能性,但就白河院得到的可能性而言,1145年以前就已经确定传入的《大观本草》的可能性要高很多。这样的话,由于《大观本草》出版于1108年,那么白河院就是在1117年前后,得到了刚出版不到十年的医书。此书可能是白河院积极地求购得来,也有可能只是海商献上的贡品。无论如何,至少从白河院和宗忠对它的珍视看来,那种高度关心是无法否认的^⑤。就算白河院得到的不是《大观本草》,仍可以看出他们对宋版医书

① 《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政和本草)》是奉宋徽宗之命对《大观本草》进行修订,将第三十、三十一卷合并为第三十卷,并在1116年刊行的。虽然如此,但在进行日宋贸易的两浙地带,似乎在整个两宋期间都不曾流传。根据《四库提要》,在《政和本草》颁布以前,宋都开封就因靖康之变(1126)被金占领,所以南宋人不知道此书的存在。而在南宋的书籍目录中,虽然《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中有《大观本草》31卷,《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中有《证类本草》32卷(目录1卷+本文31卷《大观本草》),但相对的《政和本草》30卷,却完全没有。此外,作为《大观本草》初刻本出版地的两浙路常州,虽然靖康之变后仍是南宋领土,且在其治下《大观本草》也再版了三次,但《政和本草》却要到金、元时才得出版,南宋时并未刊行。参见冈西为人《本草概说》,东京:创元社,1977年,第117—141页。

② 《直斋书录解题》称30卷,《宋史·艺文志》称28卷。

③ 以原20卷本为底本的宽政版和刻本中,有1196年的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两宋名家方书精选》本)。另外,据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三一《题百一方》所记,陈造曾在1197年得到王璆亲自赠与的“《百一选方》一部四帙”。

④ 至少从镰仓到南北朝时期(1185—1392),在代表性的日本医书中未见对《天元玉策》的参考。各书引用文献的数目为:《医谈抄》58种,《医家千字文注》53种,《顿医抄》55种,《万安方》98种,《有林福田方》154种。如服部敏良《镰仓时代医学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年,第122—124页、第150—151页;小曾户洋《〈福田方〉组成文献之解析》,《日本医史学杂志》33—1,1987年;中根千惠《典据及其周边(イ)(ロ)》,《传承文学资料集成》22,医谈抄,东京:三弥井书店,2006年(另外,此处因使用先行研究,所以会对同书异名分别计数),这些书中都没有利用到《天元玉策》。

⑤ 同时代的高丽版佛教书籍在刊行后几年内就可传入日本的事实,学者向来多有提及(横内裕人2008年第10章)。对于医书,也可作出同样的推测。

的关心,而《大观本草》确实在刊行后40年内传入了日本,这么短的时间也可以说是迅速传入了。总之,朝廷最上层的王家、公卿阶层,并不满足于《医心方》所汇编的隋唐医学成果,他们在持续不断地寻求着最新的医学成果。

二、宫廷医对宋代医书的利用

日本医书对《大观本草》的利用,要从1184年僧人莲基所编的《长生疗养方》开始。虽然这本书只有卷一和卷二的抄本流传,但卷一第13—16的“果菜效能”、“米谷效能”、“禽兽虫鱼效能”、“水冰霜雪效能”和卷二第13“诸药效能”等以“效能”为题的五处,都用同一形式列举了药剂名及其效果(另附图),所以大概是从同一来源采录的系列材料。所举药剂名前附有红点、黑点、红圈点、黑圈点,或是没有圈点。而在“水冰霜雪效能”和“主要效能”的按文中如此写道:红点代表《神农本草经》,黑点代表南朝梁陶弘景《神农百草经集注》的注,红圈点是唐代苏敬的《新修本草》,黑圈点是“诸食疗经”(唐孟诜《食疗本草》?),而无圈点则代表了《大观本草》。

根据《长生疗养方》卷一二的跋^①,莲基在1184年受仁和寺御室守觉法亲王之命,为悉备“万岁长生之术”以供御览而在高野山编选书籍。此外,他还记述自己久嗜“救命之业”,虽然老入佛门,却不忘“口传秘说”。由此可知,莲基在出家前曾经从医。再从“唯所抽丹家之要实也”推断,莲基应该与丹波家有关。所以,《大观本草》在1184年,已经被丹波家的部分人所知道了。

《大观本草》的流传起源可能是摄关家^②的九条兼实(1149—1207)。兼实《玉叶》治承五年(1181)二月十五日条下,有他召来和气定长并命他提交“疗治方”的摘抄的记录。而根据同一记录,兼实也曾命令和气定长摘抄“合药方”、丹波宪基摘抄“病源抄”、丹波赖基摘抄“药种效能”,又命令丹波知康摘抄“养性之方”,他自己也有摘录“灸治之要穴”的打算。其中关于丹波赖基的“药种效能”部分,兼实说到前年即1179年曾赐(借?)与《大观本草》,令其从中抄录。所以兼实可能是命令赖基等五名宫廷医,根据用途对《大观本草》进行略抄。从赖基自《大观本草》抄出的“药种效能”的题名看,可以推测和《大观本草》所用并收入《长生疗养方》的“效能”确实有关。很可能五种“效能”就相当于“药种效能”的一部分,作为基于《大观本草》的珍

① 近来,学者证明在京都大学本《长生疗养方》卷一二里,附有历来不为人知的跋文,其影印本收录于1998年的《医心方续编》第七卷。

② 这些名门或在天皇幼时任摄政代理政务,或任关白辅佐天皇,所以是贵族中门第最高的。

贵资料,在丹波家的相关者之间被广泛抄写。另外,赖基之子长基在1189年抄写《长生疗养方》一事见于其书卷一的跋文中,由此也可知道赖基流^①的丹波家和莲基的关系^②。

总之,在1179—1189年的短短十年内,宫廷医之间兴起了了解《大观本草》内容、直接依据其说编书、并进一步抄写传播的动向。由此可知,不仅是作为被治疗者的王家和公卿阶层,作为治疗者的宫廷医们也将宋代医书当作渴求的目标。不过即使如此,宫廷医们直到1179年为止,似乎都并未持有《大观本草》一书(假设他们有的话,兼实也就没必要借给他们了)。也就是说,负责给贵人们治疗的宫廷医们,似乎并不知道王家已有的《大观本草》的内容。就算治疗时能得一见,大概也没有熟读、抄写的机会^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这本书最初被看作王家的传家宝或权威财产,所以平时是禁止别人观看的。

虽然兼实所藏《大观本草》的传入年份无法确知,但正如1173年丹波宪基从兼实处看到《千金秘髓方》并表示是初次所见这件事所表现的^④,兼实在这一时期正勤于收集包括珍本在内的各种医书,《大观本草》或许也是在这个时期得到的。在12世纪后半的日本,到处可见新的宋代医书舶来的迹象。比如,丹波长基从北宋《苏沈良方》15卷中精选内容,于1194年著成《四花灸法》;和气定长在1183年以前,得到了所谓“年来所秘之新渡医书(年来秘する所の新渡の医書)”的《王氏篇类单方》^⑤。虽然从来没人指出,但后者很可能就是入宋僧圆尔(1235—1241年入宋)的藏书《王氏本草单方》十册^⑥。与此对应的书,是《宋史》卷二〇七“王俟《编类本草单方》三十五卷^⑦”,和《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三《本草单方》三十五卷。撰写者王俟^⑧,1136年请求

① 译注:即丹波赖基以下的丹波家嫡系。

② 长基选择抄写《长生疗养方》而不是其父的“药种效能”,可能是因为《长生疗养方》综合整理了宋版医书和历来的医学知识,而他对全部的内容都有兴趣。

③ 比如说,丹波赖基在1179年任当时的施药院使,而在1188年以名医之誉任最高医官典药头(《山槐记》文治四年十月十四日条)。他和典药头和气定成被誉为同时代宫廷医生的代表人物,然而连这样的赖基,都没有《大观本草》。

④ 《玉叶》承安三年四月十五日条。

⑤ 《玉叶》养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条。

⑥ 《东福寺文书》28、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

⑦ 译注:标点据《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315页。

⑧ 《直斋书录解題》注:“工部侍郎宛丘王俟硕父撰,取《本草》诸药条下所载单方,以门类编之,凡四千二百有六方。”(译注:中文原文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2页。标点据改。)所以著者是工部侍郎王俟,也就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称“要录”)建炎元年二月乙酉条中的宛丘监察御史王俟(译注: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

在临安府设置负责供给和贩卖药剂的和剂局^①,是与医学有关的人物。所以定长所得的他的著作,差不多就是同时代中国的本草书。王俣于1155—1156年任明州知州^②,而明州是日宋贸易的窗口,或许《本草单方》就是缘此刊行于明州,并通过贸易船被带到了日本。

宋代医书传入日本的现象在12世纪70年代以后集中出现的背景,很可能是此时期因平清盛之故而进行的濑户内航路的整備(12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虽然简单地强调平家对日宋贸易的影响是要慎重的,不过看看“从清盛时开始《太平御览》流通到日本”这类镰仓中期贵族的证词^③,似乎宋刊本流入东京确实在这个时期活跃了起来。虽然宋朝海商此前会乘船到九州的博多进行交易,但到了清盛的时代,从京都到交通便利的大轮田泊(神户)都有交易进行^④,这不是促进了书籍、书画这种高度需要现场确认的商品的流通吗^⑤?

由以上两章可见,王家、公卿等朝廷上层和宫廷医们,对宋代的医书是很期待的。医学,对于朝廷上层人物来说,是直接关系到自身生命的大事,而对于宫廷医们而言,也是保证本家繁荣的重要工具。因此,宋代医学常常

1988年,第59页)。不过未见其工部侍郎的仕历,或许是户部侍郎之误〔《要录》绍兴七年闰十月庚申条(译注:见第1867页),二十六年十月己巳条(译注:见第2881页)〕。

① 《要录》绍兴六年正月壬申条(译注:见第1597页)。《宋会要辑稿》卷六七,职官27—66,惠民和剂局,绍兴六年正月四日条(译注:见《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969页下)。

② 王俣被南宋初的宰相赵鼎所重用,赵鼎与新宰相张浚争论不合辞职后,王俣加入张浚一党。1137年张浚被罢时,王俣受到弹劾,第二年被罢免。1155年12月,因为两个月前宰相秦桧之死及其党羽被罢,王俣以明州知州复官,第二年复其旧任户部侍郎。〔《要录》绍兴七年十二月辛巳条(译注: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1894页),八年正月庚寅条(译注:见第1897页),二十六年十月朔条(译注:见第2881页),《宝庆四明志》卷一《郡守》〕其前任明州知州方滋,因赴任福州时将所得珍珠、翡翠、犀象等献给权贵之家(秦桧?),以换取明州之位,故在1155年受到弹劾,并在第二年因交结秦桧而遭夺职〔《要录》绍兴二十五年正月辛未条(译注:见第2741页),二十六年四月甲申条(译注:见第2832页)〕。代替他的王俣被认为是接近反对秦桧的一派。比如说,因王俣举荐任监察御史任古,对秦桧一党进行了大量弹劾。参见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广岛:溪水社,1988年,第389页。

③ 花山院师继《妙槐记》文应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条:“此书(太平御览)者,平家人道大相国清盛(译注:原文字号如此),始渡之。近高仓院以来,连连宋人渡之。方今者,我朝及数十本欤。”

④ 比如,根据中山忠亲《山槐记》治承四年十月十日条的记载,忠亲曾经派遣侍从到大轮田泊去购买舶来品。

⑤ 对于在博多进行的交易,京都的贵族想要确认书籍内容后再购买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判断的依据不过是从海商听来的书名而已。不过,摄关家的藤原赖长,在1150年收到宋海商刘文冲送来的《东坡先生指掌图》、《五代史记》、《唐书》后,在第二年和砂金30两一起送去了一个超过百部的要书目录,表示如果能够得到这些书,便可用船运送来。据说,这个目录原本是预备交给别的宋人的(《宇槐记抄》仁平元年九月二十四日条)。只靠书名就能订购这么多书,除了他的好学之外,我想也有摄关家的出身可以提供大量资金的缘故。假使中下级贵族的宫廷医生想做同样的事,恐怕在现实中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便成为他们期望获知的对象。

三、渡来者的医学知识

《大观本草》是名为本草书的辞书中的一种。宋代在对唐代的《新修本草》进行改订和增补后,编辑、刊行了大量的本草书,这些书屡屡被平安后期的本草书所引用^①。其中之一,就是引用了974年《开宝重订本草》和1008年《太宗重修广韵》的《香字抄》^②。平安后期的大部分本草书,是为了整理与修法遂行有关的香药资料,由密教僧人大量编纂和流传的。《香字抄》也是由密教僧人抄写和流传的,只不过,《香字抄》的编纂本身却与密教修法没有关系。本书有数种传本,其中高山寺本《香字抄》(3卷,现存仅卷上、卷下)的跋语中,有“从1166年9月从《丹波抄》5卷中摘抄出”意思的批注^③。据高山寺藏《禅上房书籍缺目录》,《丹波抄》是“丹波宿祢以来之抄”,即记录丹波各代家学的各种书抄,信西“以为类聚,又加新注”,再经1166年9月信西之子、即密教僧侣胜贤补缺而成。所以其核心就是丹波家学。比如说,卷上浅香条所引丹波康赖《医心方》无疑是其中之一,其他散见在写于日本的“或抄”“或秘方”“口传”中的引用,大部分也是丹波家学。据《续古事谈》卷五的传说(說話),丹波雅忠(1021—1088)曾因预知火灾之梦,一卷未损地守住了曾祖康赖以来世传的文书。由此可见,丹波家确实世代相传各代的记录,我想“丹波宿祢以来之抄”就属于这一类。

认为《香字抄》中有丹波家学、信西新注和胜贤补缺三要素,且最后的胜贤补缺中有密教的知识,这一点是未必的。兼意在对《香字抄》中的记录取舍选择后,加入新材料写成了《香要抄》,而据本书的杏雨书屋藏写本所附

① 利用宋代本草书的具体例子,比如,一般认为写于11世纪末以前的高山寺所藏《香药抄》写本中,引用了1061年的《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嘉祐)》(近藤泰弘:《关于高山寺藏本草相关资料——以高山寺本〈香草抄〉为中心》,《高山寺典籍文书的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又如,高野山的兼意在1125—1146年前后编纂了《香要抄》、《药种抄》、《宝要抄》、《谷类抄》等书,其中利用了1092年《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的序(森鹿三:《关于亮阿闍梨兼意的〈香草抄〉》,《冢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冢本博士颂寿纪念刊行会,1961年;古泉圆顺:《〈谷类抄〉》,《杏雨书屋藏·谷类抄》,大阪:财团法人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2004年;《杏雨书屋所藏重要文化财产〈香要抄末〉解题》,《杏雨书屋藏·香要抄末·二》,大阪:财团法人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2009年)。

② 虽然明确记有《开宝重订本草》和《广韵》书名的只有卷上的郁金香条和卷中的桂心香条,但在《香字抄》的其他地方可以散见注于末尾的“唐本先附”、“今附”,我想这些也是引用了《开宝重订本草》。在《大观本草》卷1所收的《开宝重订序》中,有“唐附、今附,各加显注”的句子,我认为这与“唐本先附”、“今附”是相对应的。

③ “永万二年九月九日,丹波抄五卷之内也。”

1156年跋语,其所参照的《香字抄》是1166年胜贤补缺以前的本子^①。在这个本子的基础上,胜贤和兼意分别增补、精选,各自形成了现行的《香字抄》和《香要抄》。所以两本书共有的注文,可以认为是胜贤补缺前的《香字抄》原本,也就相当于丹波家学和信西新注^②。

根据以上再看《香字抄》的注,被《香要抄》同样收录的两处“或抄”中,我注意到“唐僧长秀”所传的药剂调合法。具体说来,就是在卷上,郁金香条所引“或抄”中记有长秀所勘的“造熟郁金法”(另附图),和同引卷上,浅香条所引“或抄”中所记“造沉香法”,所引用基于“生师口传”的两种调合法^③。据说这两个处方是“大唐僧人长秀”的秘藏,在献给天皇后,于957年被(生师?)继承^④。这些处方似乎并不是只有丹波家才知道的秘法,《薰集类抄》中也有五处的引用^⑤。

那么长秀又是什么人呢?关于这一点,《扶桑略记》在延喜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条中引到了长秀的传。据此可知,长秀在920年随同其父由中国往波斯国途中漂流,在着陆岛上度过了几个月后,又搭乘路过的日中贸易船来到了日本。本传还记到,天台座主曾派净藏(891—964)到长秀处,以加持之法治他苦于胸病的父亲,并得到了长秀的赞叹^①。这大概是天台僧间流传的故事吧^②。《今昔物语集》中也有长秀的故事^③,却不见于史书所载。据说,长秀来到镇西后,因为居留不归,就被召到京师做医官。其后,长秀参见

① 古泉圆顺认为,这本书成于1146年前后(古泉圆顺:《杏雨书屋所藏重要文化财产〈香要抄末〉解题》,《杏雨书屋藏·香要抄末·二》,第230—231页)。此外,胜贤在1162年,因为寺内的对立,被醍醐寺座主驱逐后,曾在1165年在高野山抄写心觉(兼意弟子)所有的《香药抄》(兼意《香要抄》和《药种抄》的合编本)。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在高野山上也抄写了本草书(森鹿三:《关于亮阿闍梨兼意的〈香要抄〉》,《冢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第835—836页)。而且,因为《香字抄》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被带走的,所以有可能原本是兼意的旧藏书,后来被心觉所继承了。

② 比如说,古泉圆顺根据《香字抄》中所引《通麟记》、《金光明最胜王经》,认为本书是佛僧所撰的,但是《香药抄》中并没有如上引用,所以有可能是胜贤增补进去的内容。

③ 记录这个处方的,一般认为是“生师”的弟子。如果是和医学有关的人,这很可能就是丹波家学,不过也不能否定其是信西新注的可能性。

④ 右二方,大唐僧长秀秘藏,所献上于圣上。以此方造进公家,号借沉香。其香已好。天历十一年三月廿五日,传承之耳。

⑤ 具体举例来说:1)卷上,诸方,薰衣草条所引“或方”中说,唐僧长秀以用蜜和合之法,四度制作熏衣香,被认为是奇方。2)卷下,炮甲香中,列举了关于甲香焚烧方法的诸家说法,其中可见唐僧长秀的学说。3)卷下,诸香,沉,和《香字抄》所引“造沉香法”引文内容相同。4)卷下,诸香,藿香,以“长秀曰”的方式,引用了藿香的采集和保存方法。5)卷下跋文中有“亦大唐僧长秀云,热郁,摘郁金花,和白蜜所作之物也云云”。虽然可能与《香字抄》卷上所引“造熟郁金法”有关,但引文有所不同。

京都五条西洞院的桂宫时,他看到宫前的桂树,便让童子登上树,砍下枝条,说道:“桂心乃此国亦有之物,无见而知之医师,事极可惜之事也(桂心ハ此国ニモ有ケル物ヲ、見知ル医師ノ無カリケレバ、事極テ口惜キ事也)”。在这里,长秀被描述成一个具备日本人所没有的香药知识的人物。

就像1066年向日本朝廷献上灵药的王满那样,香药是来日宋朝海商所贩卖的商品之一。1062年,王满的宿房里飘出鹿鸣草的香气,异朝通事吴里卿随即向他本人询问了此事。吴里卿具备香药知识,很可能是被大宰府任命为通事的宋朝海商^④。另外,1048—1173年间六次访日的明州海商陈咏,曾在日僧成寻访宋期间担任他的通事。他曾经携《本草括要》一帖拜访成寻,而成寻因他“颇知医道故”^⑤,送了他一卷《养生要集》^⑥。因为量轻价高的香药在贸易中也是重要的商品,所以为了提高利益,香药知识也是很重要的^⑦。从长秀原本也是向“波斯国”旅行看来,他很可能是与南海贸易有关的海商,那么他具有和商品香药有关的知识也是毫无疑问的。

《今昔物语集》随后还记道“然,长秀造药奉公,其方于今有传语(然レ

① 唐僧长秀,与其父共行波斯国之时,漂荡海路,寄灯炉岛澡中,数月经迴之间,其父风痼发动,恼于胸病。适遇不虑便船,仅到着日本国。其病倍增,苦痛炽烈。爰长秀父病不觉之由,启闻天台座主增明命和尚。座主云:“我朝有十人之验者。净藏是日本第三验者也。招请遣之。”净藏乘撰,往到加持,药师真言一百八遍,即时应声,其病平痊。长秀感叹云:“唐朝邻于印度,佛法灵应,甚以揭焉,然未有如此之人矣。东海别岛圣人。效验奇异。因此定知,可无第一第二矣。”

② 长秀的记录也见于《扶桑略记》延长三年十月七日条和延长六年三月二十日条,据此可知,他在925年和928年在谷仓院领受薪给。在925年的记录中,似乎大宰府并没有长秀是唐人的报告(“实虽唐人,大宰府未申其由”),却将他纳入管理范围内(大宰府鸿炉馆?)。在《贞信公记抄》延长三年十月七日条中,同一人物以“唐人平秀”出现,姓名不同的原因不明。

③ 《今昔物语集》卷二十四第十,《震旦僧长秀来此朝被仕医师语》(译注:参见中译本《今昔物语集》,金伟、吴彦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第1092—1093页)。

④ 这两个事例都是山内晋次介绍的(山内晋次:《围绕〈香要抄〉的宋海商史料》,《东亚游学》132,东亚的结合物、结合场,东京:勉诚出版,2010年,第61页)。吴里卿的官衔据《香要抄》鹿鸣草条,写作“异州通事”。贵重图书影本刊行会复制本的高山寺本《香字抄》卷下,鹿鸣草条眉批所引《采女正俊通抄》中也有相应的记录,虽然因为虫蛀使得“州”字不太清晰,但仍可看出是“异州通事”。不过,石山寺本影印本《古辞书音义集成》13却明确写作“异朝通事”,而且根据语义,也是这个更为妥当。另外,应该知道的是,提供了《香要抄》中未见材料的《才女正俊通抄》,是11世纪后半的医生惟宗俊通的抄录(新美宽:《香字抄解说》,《香字抄》,京都:贵重图书影本刊行会,1936年,第7—8页)。

⑤ 译注:据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76页。

⑥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熙宁五年四月十九日条、六月五日条、六年正月六日条。

⑦ 因为海商会虚报高价药名,抬高香药价格,又会把假货染色,强行买卖,所以关于香药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又云,有英宿香者,近来来朝之者等,谓之安息香,是误也(其体貌,不敢似安息香。而商人等,为炫利,以非为是耳。宛如麝香、桂心等云云)”(《香字抄》卷上,安息香条)。“或抄云,是紫色之栴檀也。……而近代来朝之商客等所持来染木、无敢其真香。宛如有名无用”(同卷中,真紫檀条)。

バ、長秀藥ヲ造テ公ニ奉タリケリ。其方于今有トナム、語り伝ヘタルトヤ)” ,即长秀向朝廷献药,其调合法一直流传至今。因为在《今昔物语集》编成的12世纪,仍流传着长秀的调合法,所以引用其部分内容的大概就是《香字抄》《薰集类抄》。总之,长秀的调合法提交给朝廷后,被宫廷医的书抄和受王家之命编纂的合香制法书所引用。贵族们不仅收藏宋版医书,也注意保存渡来者所带来的中国医学知识。如此想来,《通宪目录》第39柜中的《宋人密语抄》一卷也值得注意。宋人是不可能特地把书名冠以“宋人”的,所以这应该是在日本写成的书。如前所述,本目录第37—40柜集中收录医书,所以《宋人密语抄》应该也与医学有关,很可能是对渡来者所带来的医学知识的整理,或者就是长秀所提交的处方^①。不过还要注意的,由渡来者所得的医药知识,即《香字抄》所引二方、《薰集类抄》所引五方(因有一方重复,故合计六方)全都与长秀有关。在两本书编成的11—12世纪的时间点上,如果宫廷医和朝廷收藏的只有长秀的处方,也有可能那单纯是作为例外的东西而被重视的。

不过即便如此,这只是渡来者通过官方传播医学的故事,贵族们在私下所接触的渡来者的治疗绝对不止如此。比如说,1014年藤原实资从宋医惠清处获得两种眼药的例子^②,就表现了贵族受惠于宋人治疗的可能性。而这个药是以砂金十两从大宰权帅藤原隆家的使者清贤处换来的,所以惠清应该是大宰府鸿胪馆等北九州的大宰府、或者博多附近的宋朝医生。关于隆家赴任大宰府,《大镜》内大臣道隆条记有他治疗眼疾想见能治眼病的唐人的故事,所指的眼医可能就是惠清。大概当时的贵族们,私下里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接触着渡来者的治疗。

结论

在平安时代,王家、公卿阶层和宫廷医们很关心同时代的中国医书。白河院很可能获得了刊行不久的《大观本草》,并作为珍贵书籍传给王家。12世纪70年代前后,宋版医书借由摄关家和宫廷医大量传入,其成果直接反映在宫廷医的著作中。此外,贵族社会可能还保管着从渡来者处直接听来的医学知识,并在私下里接触着渡来者的治疗。

概而言之,平安贵族关心着与医学有关的同时代的中国,换言之,他们

① 如果要强调“宋人”,那么五代十国的长秀似乎和此书无关,不过这也可能是宋代建立以后,后人添加的书名。

② 藤原实资《小右记》长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条。